

學術對談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對談人：周樹華、閔岩



周樹華教授
(Prof. Shuhua Zhou)

「真正重要的研究需要不同程度的抽象化過程，相應的，也要求研究者有在不同的抽象化層次之間轉換的能力。不同的抽象層級關注不同的問題。抽象層級通過將研究對象細化或整體化，幫助我們釐清和界定概念。通過確定一個特定的抽象層級，我們可以實現概念的清晰化；通過明確研究所處的抽象層級，我們可以確定研究邊界和研究範圍；通過提升抽象層級，我們可以識別群體的共性、模式或原則，並延展其適用情境或群體的廣泛性。」

周樹華，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座教授。研究興趣：媒介信息認知、媒介心理、媒介內容和形式、媒介效果、國際傳播和視覺傳播。電郵：shuhzhou@cityu.edu.hk

閔岩，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危機傳播、媒介效果。電郵：yanyan2019@ruc.edu.cn

Dialogue

Navigating Levels of Abstraction

Discussants: Shuhua ZHOU, Yan YAN

Abstract

This academic dialogue touched on a number of pressing issues fac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fering insight on research focus, productivity,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philosophy. Prof. Zhou argues that an academic partnership between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s important in fostering a research environ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He also considers curiosity, rigor, and persistence to be the keys to productivity. The dialogue also centers on how newer technology, such as AI, may impact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nd research.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ou, S., & Yan, Y. (2024). Navigating levels of abst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9, 1–15.

Shuhua ZHOU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cognition of mediated messages, media psychology, media content, format and effec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Yan YAN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risk communication, media effects.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周樹華教授簡介

周樹華教授現為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國際傳播學會 (ICA) 會士、國際中華傳播學會 (CCA) 前會長 (2017–2019)、亞太傳播聯盟 (ACPC) 副主席 (2018–2025)。《*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主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和《*傳媒與社會學刊*》編輯、多本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 期刊編委；曾任廣東電視台新聞部播音員、英語新聞組組長；阿拉巴馬大學教授及副院長、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 Leonard H. Goldenson 講座教授、南洋理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等。

周樹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媒介信息認知、媒介心理、媒介內容和形式、媒介效果、國際傳播和視覺傳播；曾出版《*傳媒鏡鑒：國外權威解讀新聞傳播教育*》、《*Research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媒介效果與社會變遷*》等學術專著和教材，發表論文和專著章節近百篇。

ZS：周樹華

YY：閔岩

YY：您的學術生涯已逾 20 年。卻顧所來徑，您如何描述您的學術脈絡？

ZS：在學術這條路上，我是一個「晚來」的「雜家」。我本科在華南熱帶作物學院讀農學後留校。當時，學院決定在已有的師資中選拔英語老師，我又去暨南大學讀了英語文學學士並回華南熱帶作物學院執教。在教書的第三個年頭，廣東電視台在全省範圍內選拔英文節目主持人，我出於對大眾傳媒的興趣，決意離開教育界而投身新聞界，自此正式與新聞結緣。在廣東電視台工作六年後，我遠渡重洋，在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先後攻讀新聞學碩士和大眾傳播學博士。

不同學校、學科和職業的經歷為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讓我能夠明晰不同學科的運作方式，了解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的研究路徑。我經常可以觀察到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在不同的抽象維度上思考問題，此時，他們的討論失之交臂而無法互通互鑑；我時時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9期(2024)

可以感受學術研究和專業實踐的聯繫和距離，進而促使我思考，當理論不必然具備現實意義時，其作用和價值如何體現；同樣基於我跨學科的背景，我經常能夠超越單一學科的邊界與藩籬，看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更大圖景。

我主要從事短期媒介效果研究，同時也深味長期效果的重要。每當我在一篇報道、一段視頻、一個鏡頭這種維度上設計我的研究時，我總是會想起農學院那些從事熱帶作物研究的師長、同學和同事。農學家們的研究對象是植物，而一棵橡膠樹需要10年才成熟，他們往往要等待10到20年才能看到自然情境中的實驗結果，整個職業生涯也不過幾代樹種的迭代。而我的許多研究則關注人們在幾分鐘甚至幾秒鐘的時間內對信息的瞬時反應。這種學科範式的碰撞令我總是傾向於把一個短期效果放到更古老的人類信息傳播活動中去討論和思考。

YY：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研究重點會是甚麼？

ZS：我向來建議自己的學生專注特定領域、圍繞特定項目開展有計劃的研究。如此，她可以很快地成長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更系統地了解該領域的宏觀圖景和微觀情態，更有機會開展系統性、持續性、有生發力的研究，從而更快地在學界嶄露頭角。這方面的例子大家可以看看議程設置理論的大家Maxwell McCombs和Donald Shaw、培養理論的George Gerbner、情緒管理理論的Dolf Zillmann等。

話雖如此，我對這一建議卻未能很好地親身踐行。因為我的職業生涯經歷了不同的學校、地域、行政職務、合作者和博士生，我必須根據這些變化不斷調整我的研究對象。我先是在阿拉巴馬大學工作了將近20年，大部分研究都與我碩博期間所學習的認知心理、生理心理和媒介效果方面的研究有關。Jennings Bryant和Dolf Zillmann兩位受人尊重的前輩和同事創辦了各種完善的實驗室和博士生項目，為我的研究提供了優越的外部條件。

2018年，我加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當時，學院發展的重點方向之一是解決當今新聞業面臨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子方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向是研究媒體數字化轉型及其對傳媒產業和媒介教育的影響。在這個總方向下，我的研究領域之一是聚焦媒介可供性，即不同屬性的媒介何以影響人們對新聞信息的學習和理解。例如，印刷媒介屬於主動式媒介，因為文本閱讀需要受眾集中注意力，主動獲取信息；電視則是一種被動媒介，同時也是一個情感媒介，它通過視聽手段傳達信息、調動情緒，使受眾在被动接受中被電視的信息和情感所左右。未來一段時間裏，我仍然會關注新聞信息及其呈現方式對人們信息處理的影響。

我去年加入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的大學和美國的大學各有所長。後者更重視基礎性和前沿性研究，強調學科的全面性和基礎性；前者則因為普遍年輕，所以更注重研究的短期影響力與學科/學校排名。這就對我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裏，我需要將我的研究專長與學術基金和高影響研究相結合。

YY：20年間，您的學術研究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保持著穩定且高產的節奏。最新的數據顯示，您是本領域科研活躍度全球前5-10%的學者。您如何保持一個旺盛且持續的學術生命力？

ZS：我比較擅長處理多線任務。一般來說，我會同時推進10到20個項目。它們處於不同的執行階段：有的可能在出版校對階段，有些可能正在改第一輪或第二輪，有些在數據採集或數據分析階段，有些在研究設計階段，有些則剛有初步概念。因為學術論文通常需要很長的發表週期，如果你只做兩三個項目，並且希望一個項目完全結束之後再做另一個項目，那便不可能高產。更理想的是，這些單體項目都是某個整體項目的一部分，由此，處於不同階段的研究可以互為補充、互相啟發、前後相繼，並且從不同角度構成對一個中觀或宏觀問題的系統性回答。

這就涉及第二個訣竅，就是保持系統性思考。我不主張零敲碎打地開展研究，相反，我喜歡構建有延展性的研究系列。多年前，我和Betsi Grabe準備研究煽情新聞。我們先通過一篇綜述文章完成概念闡釋和歷史回顧，然後通過內容分析法，探索煽情新聞的類別及其表現形式，最後根據內容分析的結果，通過控制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9期(2024)

驗考察煽情新聞的效果。如此，我們就完成了對研究對象的系統性考察。

我同時篤信多元視角的重要性。這就需要一個涵蓋多種人才的團隊。當你和其他同事、學生、學者合作時，往往會碰撞出新的想法、新的專業知識和新的技能；在一個團隊中，有人擅長理論、有人擅長數據分析、有人擅長寫作。這種多元協作的團隊是高產的關鍵。

此外，時間管理也是一項重要能力。我的生活不只有科研，還有各種各樣的行政和社會服務工作，還有家庭和社區的日常生活。面對這些林林總總的主線和支線任務，我的處理方式是，每天保證一段時間，或者每週保證一兩天是專門屬於學術的。我會在這個專門的時間裏，待在一個安靜的、專門的工作空間裏，不受干擾地專注於我的研究。

最後一點，永遠不要失去好奇心。你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通過閱讀、會議、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偶遇和交談，不斷獲得新的知識和靈感。我從來不將行政或社會服務工作視為對學術精力的「擠佔」。相反，我會努力在這些工作中找到與學術研究、知識積累或學術靈感的交集。比方說，我擔任了一些期刊的編輯工作，這佔用了大量時間；但對我而言，它也能讓我及時接觸學者們最新的研究理念和成果，時時給我靈感和啟發。此時，這類工作對我而言就不是負累，而是積累新知識、邂逅新靈感的契機。我自己很喜歡一句話，雖然我忘記了它的出處：「人的知識就像一個圓，圓內是你已知的部分，圓外則是你無知的部分；一個人的知識越多，就越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無知。」——學術研究也是如此。永遠不要滿足於已知的世界，永遠懷抱好奇，然後去探索它。

以上都是我的個人經驗，不一定適合所有人。實際上，保持效率的秘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都可能需要不斷嘗試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隨機應變、堅持不懈、善於反思，這樣才能激發自己的學術生命力。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YY：我注意到，您從博士論文起就關注新聞產生、消費和效果方面的研究，剛才也將新聞研究描述為您的主要學術脈絡之一。您能否講述一下您的個人經歷，並分享一下，個人的新聞實踐經歷與學術研究應如何結合？

ZS：我本科的主修專業是農學，本該成為一名生物學家；但由於留校後學院需要英語教師，我就被選派去暨南大學學習英語；執教三年後，又因為廣東電視台要開一個英文新聞節目，因緣際會之下，我成為一名英文節目主持人。自此，我便與新聞結緣。

我博士期間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實驗法研究短期媒介效果。新聞報道通常時間短、主題多，是十分理想的研究對象。比如，當我通過生理心理學實驗收集參與者的生理數據時，由於數據的收集和清理十分繁瑣，刺激材料的時長不可能以小時計，因此，電影和電視劇就不是理想素材。相反，新聞報道的時長通常為幾十秒至幾分鐘，這種短時間的媒體內容和我關注短時媒介效果的研究取向非常匹配——當我們研究人們的注意力時，我們關注的是每時每刻的注意力變化；當我們研究知覺時，我們談論的是特定的對象、格式和內容。如果以電影、電視等長篇影視作品為研究材料，實驗中會有太多無法控制的「混淆」因素，令我們無法作出因果推論；相較之下，短新聞報道更容易控制，我們可以更容易地操縱它的內容，回答因果推論。

我主要運用認知心理學理論考察人對新聞信息的認知，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新聞信息形式，包括其表徵、應用和操縱；第二，新聞認知的的基本過程，包括感知、注意和記憶；第三，認知中的個體和情境差異。我認為，新聞的形式和內容一樣重要。我圍繞新聞包裝展開了一系列研究，考察小報式的「花裏胡哨」的設計、刪減與編輯、視聽冗餘、視覺差異等在人的新聞認知方面的不同效果。當然，拋開個體差異和情境差異考察新聞認知效果是不完整的：熱衷於新聞使用的人和很少關心新聞的人不同，黨派新聞消費者與中立消費者不同。我傾向於綜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種視角，既研究一般認知反應的新聞效果，又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9期(2024)

其置於個體和社會的差異化情境中，以獲得人類新聞信息認知的更為全面的圖景。

YY：目前國內外很多高校面臨一個困境，即，有業務經驗的老師很難達到學術發表的門檻，而專注學術研究的老師又缺乏實踐經驗，使得教導學生力有不逮，學術研究也難以切中現實問題。您認為，學界當此困境，有甚麼解決方略？

ZS：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大陸高校的困境，也是全世界高校的困境。

新聞與傳播教育起源於職業教育，因而非常看重技能培訓；但高等教育的最終目標又是科學和知識生產。這就導致新聞傳播學科時時處於兩難之境：學科的立身之基究竟是甚麼？是提供對新聞現象的學理闡釋，還是投身新聞活動的具體實踐？當前，全球新聞學院通常兼顧這兩項需求，既提供學術教育，又培養實踐技能。相應的，在師資配比上往往也需要兩種類型的師資兼顧：教學研究型教師通常專注於學術研究和學術追求，可能會優先考慮理論問題或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業務型教師則更關心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通常考慮的是眼前的、當下的、直接的行業問題。這兩種取向也投射出學界的研究重點和行業的實際需求之間的分野。

對於前者而言，目前全球新聞傳播院系的大部分研究型教師都缺乏專業實踐。他們的人生幾乎都在象牙塔裏渡過，在一個又一個學位之間不斷升級，卻鮮少對新聞行業的現實感知。他們擅長研究，卻不善於發現行業面臨的問題；他們擅長發表論文、建立模型、建構概念，卻往往不擅於提出「真問題」。對於業務型教師來說，他們通常擁有豐富的行業經驗，但沒有接受長期的科研培訓。他們的專長在於實踐技能和行業知識，卻可能局限於具體的、零散的、表面的現象，而缺乏透過現象提出問題的本領，缺乏將問題放在更宏大的語境中、將其抽象化以具有普適性的能力，缺乏與通行學術規範對話的必要的學術訓練。這令他們時時感到難以順利完成從記者到學者的身份轉型。

上述挑戰並非某一個教師的個人困境，也無法靠個體的力量解決，而是需要學界、業界和教師各方的合作。我們需要鼓勵研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究型教師和業務型教師之間的合作。這意味著不同特點的教員之間可以優勢互補，共同對現實問題進行學理化研究。例如，我在密蘇里的同事Damon Kiesow是一位具有豐富的報紙數字化工作經驗的編輯。在過去的幾年裏，我與他展開一系列成功的合作。我們並沒有僅僅關注舊報紙如何數字化這個表層問題，而是回到媒介的概念，考察每種媒介——我們的研究案例是印刷媒介和數字媒介的媒體屬性如何影響內容呈現與傳播效果。他貢獻了大量的業務經驗、鮮活的一手知識，無盡的妙思和充沛的靈感，而我則基於我的研究經驗和理論積累，提議將該問題置於James Gibson的生態心理學框架下，考察不同媒體的可供性及其在數字平台化過程中的可供性功能轉化。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合作，它既解決了一個實際問題，也將研究提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是業務型和研究型教師合作的理想案例。

當然，這只是我和Damon之間的個人探索。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學院或者學界應該通過各種方式，輔助兩類老師克服其短板，走出舒適區。如，應當鼓勵研究型教師參加行業會議、研討會、培訓項目，幫助其增強實務知識、了解業界發展趨勢、體驗行業現狀；也應當為業務型教師提供必要的學術培訓，幫助其將個體經驗概念化、理論化和規範化。如此，通過促進兩類教師、以及兩類教師所代表的學界範式和業界經驗之間的合作，新聞傳播學的高等教育才能兼顧為學界和業界培養人才的初衷。

YY：您認為，未來新聞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何在？

ZS：在過去20年裏，新聞業始終處於高速變化之中。我認為在未來新聞學研究會有以下幾個新趨勢和新領域。

一是數字技術對新聞生產樣態的影響。幾十年前，中外新聞業的媒體技術和設備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我現在還能記得我剛從廣東電視台的記者成為印第安納大學的一名碩士時，在學校使用NeXT電腦和電子郵件時的那種震撼。那時候，一個電視新聞至少需要司機、攝影師、記者和燈光/設備技術人員組成一個四人技術小組才能完成；而在數字新聞時代，我們給學生傳遞的新聞實踐理念變成了「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技術對新聞生產、傳播

和消費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未來的學術研究也應該關注諸如人工智能、自動化、數據新聞、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等技術在塑造未來新聞業中的作用。

技術在升級媒體實踐的同時也影響了媒體的社會性構面。技術對媒介倫理、媒介素養、媒介信任等一系列媒體社會性規範的影響也應該為學界所重視。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數字信息不再經過專業的把關過程，造成「假新聞」氾濫和信息過載，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公眾對新聞業的信任危機。因此，學界須繼續研究如何通過提升透明度、規範事實核查、堅持負責任的新聞報道，以反擊假新聞、提高媒體素養和重塑公眾信任。例如，在媒體素養研究中，Eric Bucy 和我正在引入新聞知識的概念，即公眾掌握的新聞知識——包括新聞的運作方式、信息的選擇標準等——越多，對虛假和不實信息的免疫力就越強。

第三，我們還應該對受眾參與展開更多研究。鑒於新聞業的交互性與受眾參與性逐漸增強的事實，學術研究應探索受眾參與的新模式，如用戶生成內容、公民新聞和協作新聞學等。我們不僅需要關注這種新的新聞樣態，更應該致力於探索如何在受眾日漸獲得話語權的同時，培養其社會責任感，約束因為技術權力加身而產生的負面社會影響。

此外，技術還改寫了新聞業的商業模式。隨著傳統新聞業營收的連年下跌，學業和業界都應探索新聞業未來的可持續性商業模式，如替代性融資模式、非營利性新聞、會員模式和眾籌模式等；在更進一步的意義上，研究者更應該關注上述的新模式在傳媒經濟學領域的新概念、路徑和範式。

最後，隨著全球範圍內極化現象日益突顯，未來新聞學研究也應聚焦全球視角和跨文化研究：一方面應當關注那些全球性、普適性的問題，考察在全球化語境下，不同文化、政治和社會經濟語境中的媒體系統、新聞實踐、生產者和消費者們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另一方面，區域國別的比較研究和國際合作也將揭示新聞業的多樣性與在地性，揭示媒體技術如何與地方性文化、規範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和人的行動相結合，製造出地方性危機，或者激發出地方性的特殊媒介實踐樣態。

YY：說到跨文化研究，這不僅是您的學術主線之一，也是您學術生涯的一個突出特點：您培養了很多中國籍的學生，並給很多中國學生提供了接觸國際學者、學校和學術交流渠道的機會；您是多家國際知名期刊的主編或副主編，並策劃了很多中國研究專題；您是包括CCA、亞太新聞傳播學會聯盟(APCA)等著名跨國學術組織的主席或副主席。您是有意識地成為了一個溝通東西方的研究者、組織者和教育者的角色嗎？您如何定義自己的這個角色？

ZS：我之所以能夠擁有你提到的上述諸種經歷，是因為我在職業生涯中不斷遇到很多優秀的人。我和他們開展合作，進而不斷獲得新的生命體驗。

我有幸與許多知名學者共事。在研究生階段，我師從David Weaver、Annie Lang等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我的第一份工作使我成為Jennings Bryant、Dolf Zillmann、David Ewoldsen等學界泰斗的同事；我也有幸遇到很多了不起的合作者，像Betsi Grabe、Erik Bucy和魏然等教授。我們往往從合作論文開始，進而推進到項目、編著、期刊、會議等其他領域的合作；我還有很多優秀的博士生，他們帶著年輕的頭腦、充沛的活力和新鮮的靈感，並且很多人在畢業後也跟我保持長期的聯繫或者合作關係。

這些相遇不同程度地推動我走向職業生涯的一個又一個階段。我在阿拉巴馬大學任教時，Bryant接替Zillmann擔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長；他退休後，我接替了他的職位。後來，我從阿拉巴馬大學到密蘇里大學再到香港城市大學工作，結識了更多的人，也獲得了與世界各地的傑出學者合作的機會。與來自不同文化、工作背景和人生經歷的合作者們交流得越多，我感興趣的事就越多。我從來不把學術作為我的唯一工作；相反，我是通過學術獲得更多了解世界、體驗生命、感受文化的機會。

YY：您研究工作的另一個特點是關注現實問題。在您看來，將現實問題「學術化」的關鍵能力是甚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9期(2024)

ZS：真正重要的研究需要不同程度的抽象化過程，相應的，也要求研究者有在不同的抽象化層次之間轉換的能力。不同的抽象層級關注不同的問題。抽象層級通過將研究對象細化或整體化，幫助我們釐清和界定概念。通過確定一個特定的抽象層級，我們可以實現概念的清晰化；通過明確研究所處的抽象層級，我們可以確定研究邊界和研究範圍；通過提升抽象層級，我們可以識別群體的共性、模式或原則，並延展其適用情境或群體的廣泛性。

研究者必須意識到，重要的現實問題從來都不限於個案，而是由案例本身、產生情境和促成要素等一系列複雜要素構成的完整的問題鏈；更重要的是，個案絕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與其他案例有所勾連，從而生發出具有普適性的中觀問題。比方說，為甚麼 TikTok 大受歡迎？它的回答絕不是單一的，而是包含一系列因素，如它的即時記錄功能、情感傳遞功能、娛樂功能等等。這些功能又對應著不同的社會性和心理性構因，因此，它可以生發出一系列延展性問題，如即時記錄功能為甚麼優於延時記錄功能？為甚麼人們喜歡 TikTok 的情感表達組件？這個軟件能提供的娛樂功能和其他軟件有何不同？更進一步來說，對 TikTok、Facebook、WhatsApp、微信等熱門社交平台而言，如果我們只研究其中的一個，那就僅僅是案例研究；如果我們提升一個抽象層級，我們就在社交媒體平台的層面上討論問題；再往上一個抽象層次，我們就會看到包含傳統媒體在內的整個媒體生態。

將具體的新聞實踐問題理論化通常包含以下步驟：第一，界定問題；第二，將問題抽象化，置於一個具體的理論情境中；第三，應用相關理論框架分析和呈現問題的複雜性。以新聞敘事這個具體的新聞實踐為例：首先，我們的初始問題是，為甚麼新聞要講故事？這時我們需要界定它的切入視角：是要做一個敘事研究，還是做一個效果研究？然後，我們將這個問題置入一個理論情境中，通過梳理文獻，結合我的研究興趣和研究目的，我決定採用亞里士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對戲劇理論的闡述。亞氏修辭學將說服手段劃分為訴諸道德(*ethos*)、訴諸情感(*pathos*)和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訴諸邏輯 (logos) 三種，與在新聞報道研究中涉及的敘事邏輯、信息可信度和邏輯進展密切相關。因此，我選擇該理論框架，並將其應用在對觀眾注意力和參與度的研究中。接下來，我們需要通過將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實踐問題，如將訴諸道德與記者和主持人的可信度、將訴諸情感與新聞中的情感呈現與情感效果、將訴諸邏輯與新聞原則聯繫起來。在這個例子中，理論提供了一個讓我們理解和分析新聞敘事實踐的視角，實證數據則提供了基於具體情境的洞見。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我們的研究就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新聞敘事的哪些因素有助於促進觀眾參與；進而幫助研究者了解新聞在理論和實踐中面臨的挑戰，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實質性意見。

YY：願意跟我們聊聊您跑馬拉松的興趣嗎？這項運動對您來說意味著甚麼？

ZS：我一直十分熱愛體育運動。說起來還有一件趣事。早年我在廣東電視台做記者的時候，因為會說一點法語，所以獲得了獨家專訪時任國際足聯主席 João Havelange 的機會。但我的法語又沒有好到能夠和他無障礙交流的地步，最後還是時任國際足聯秘書長、後來擔任國際足聯主席的 Joseph S. Blatter 用英語給我們做了翻譯。

我最近幾年才開始跑馬拉松。這是一項迷人的運動，對我來說也是一項不小的挑戰。幾年前，我在上海做學術演講期間，不慎在一次跑步中傷了膝蓋。醫生說這跟我的訓練方式是否合適無關，主要是因為我年紀大了，已經不適合做長跑類運動。但我認為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更了解，此後便開始用做科研的態度「研究」恰當的跑步方法。我總是說，做研究的人和不做研究的人有很大區別。比如說，做研究的學者會更加明瞭新聞角色的複雜之處，而不是以「把關人」這一簡單概念籠統概括。同樣，在研究馬拉松後，我了解到配速、法特萊克訓練法 (Fartlek)、後段加速、磨損、碳板等一系列專業術語，以及它們背後一整套嚴謹的跑步專業知識。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9期(2024)

學術也有如一場馬拉松，需要嚴謹、堅持、明確的自我認知和可執行的提升計劃。在運動中，你會受傷，會有挫折，就像在學術研究中試驗會失敗、投稿會被拒一樣，但你需要持之以恆，修身自律。你練習得越多，就會學到更多知識，進而改進方案，獲得更好的成績；當你取得了一個成績之後，就會被這種成功的喜悅所激發，投入下一個挑戰。

在美國，很多選手想跑遍50個州；我也遇到不少亞洲選手要到世界各地參賽。在學術研究中，你也可以說，希望自己能發遍所有的傳播學期刊。我不認為自己真的可以做到，但這始終是我渴望的目標。過去的四年裏，我跑了15場馬拉松，我享受每一次的出發和到達；在過去差不多30年的學術道路上，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還有一個又一個的學術馬拉松等著我去攻克。

周樹華教授著作選

- 周樹華、閆岩(2015)。〈媒體可信度研究：起源，發展，機會和挑戰〉。《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3期，頁255–297。
- 鍾新、周樹華(編)(2006)。《傳媒鏡鑑：國外權威解讀新聞傳播教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魏然、周樹華、羅文輝(2019)。《媒介效果與社會變遷》(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Grabe, M. E., Zhou, S., Lang, A., & Bolls, P. (2000). Packaging television news: The effects of tabloid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evalu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4(4), 581–598.
- Zhou, S. (2005). Effects of arousing visuals and redundancy on cognitive assessment of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9(1), 23–42.
- Zhou, S. (2022). The need f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a JOBEM synthesis editorial.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6(4), 511–514.
- Zhou, S., Beasley, B., & Sloan, W. D. (Eds.) (2022). *Research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4th ed). Vision Press.
- Zhou, S., Kiesow, D., & Guo, L. (2021). The values of print: Affordances and sensemaking for newspaper consumers. *Journalism Practice*, 17(2), 336–353.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本文引用格式

周樹華、閔岩 (2024)。〈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9 期，頁 1–15。